

焦點熱議

方靖之

朱凱迪挑戰「反港獨」底線自尋DQ

「自決派」「議會陣線」立法會議員朱凱迪早前報名參加村代表選舉，選舉主任近日去信，要求朱凱迪確認自己真誠擁護《基本法》，以及解釋其「自決」立場的意思。朱凱迪的回覆指自己不支持「港獨」，但又不反對別人和平主張「港獨」，他更認為香港人應該決定自己命運，並強調和平主張「港獨」是港人受《基本法》保障的權利云云。

朱凱迪雖然不斷狡辯，但有一點十分明確，他是一名「自決」分子，他支持「香港自決」並且支持所謂「煽獨」的權利。這樣已足以證明他不具備參選公職的資格，更不具備擔任立法會議員的資格。「豬隊友」或者是希望挑戰「反港獨」的底線，以顯示自己「勇武」形象，但結果卻是自尋DQ，在兩年後的立法會選舉DQ朱凱迪參選資格，將更加理直氣壯，也更加順理成章。

胡謔基本法保障「港獨」

朱凱迪回覆選舉主任的問題中，至少有三大荒謬之處。

一是他指主張「港獨」是港人受《基本

法》保障的權利。《基本法》明文保障香港居民的基本權利及自由，包括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但同時，《基本法》開宗明義表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港獨」煽動分裂國家，損害國家的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否定「一國兩制」，違反中國憲法，《基本法》有可能會保障「煽獨」的權利嗎？同一道理，美國憲法會保護「肢解」美國的權利嗎？世界各國都有禁止叛國、禁止分裂國家和禁止顛覆的法律，任何人不得逾越，朱凱迪聲稱《基本法》保障「煽獨」權利完全是一派胡言。

二是他主張「香港自決」，並認為此舉沒有違反《基本法》。「自決」就是不同名稱的「港獨」，在本質上同樣是鼓吹香港可「自決」脫離國家，可「自決」決定「獨立」，根本就與「港獨」沒有分別，同樣是違反《基本法》。在上一次港島補選中，「香港衆志」周庭最終被選舉主任取消參選資格，原因是「香港衆志」的「民主自決」綱領違背《基本法》。這說明在之後的選舉中，

任何主張「民主自決」的政黨或人士，都不可能「入閘」。朱凱迪要宣揚「自決」是他的個人自由，但代價就是不能參加公職選舉。

其實，全世界的選舉都有各自的守則，都有不同的門檻和底線，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三款列明：「任何人，凡是曾經以國會議員、合衆國政府官員、州議會議員或任何州的行政或司法官員的身份，宣誓擁護合衆國憲法，而後來從事於顛覆或反叛國家的行為，或給予國家的敵人以協助或方便者，均不得爲國會的參議員、衆議員、總統與副總統選舉人，或合衆國政府或任何州政府的任何文職或軍職官員。」但從來沒有人說美國剝奪這些人的參選權。難道《立法會條例》規定參選立法會議員要年滿21歲，又是剝奪20歲或以下人士的參選權？朱凱迪要煽動「自決」就不能參選，十分明確，何來剝奪其參選權？

三是他因不滿選舉主任的質問，竟指選舉主任「無權力」提出與「確保提名有效無關」的問題，更偷換概念稱選舉主任的問題是「帶着錯誤的假設」，繼續拒絕直接回應

有關的質疑。選舉主任有沒有權力審核參選人資格，不是朱凱迪說了算，而是法律說了算。

立會鄉選審核原則一致

香港法例第576章《鄉郊代表選舉條例》第24條清楚列明：「除非提名某人為鄉郊地區的選舉的候選人的提名表格載有或附有一項由該人簽署的聲明，示明該人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否則該人不得獲有效提名。」即是凡參加鄉郊代表選舉者，都必須聲明自己擁護《基本法》。至於誰人把關？高等法院在陳浩天的選舉呈請案中清楚指出，任何人參加立法會選舉時，須簽署聲明效忠特區及擁護《基本法》，這是參選的實際要求，亦因如此，「很難說選舉主任沒有法定權力去判斷提名人有沒有實際上符合（效忠要求）」。

按普通法原則，高等法院對選舉主任權力的解釋，亦適用於鄉郊代表選舉的選舉主任。即是說，選舉主任絕對有權審核以至否決其參選資格。而現在所有證據包括朱凱迪

自己都親口承認，他主張「民主自決」，這樣DQ他自然是合情合理合法。

或者，朱凱迪是故意借參選村代表，一方面測試一下遏制「港獨」底線，另一方面也為自己將來參選探一探水溫。但現在已經可以清楚告訴朱凱迪，從他以往的所作所為可以斷定，他的參選之路已經斷絕，這不但在於他一直主張「暗獨」、「自決」違反《基本法》，更在於他與劉小麗等人 在2016年7月曾聯署一份聲明，提及「我們必定捍衛『香港獨立』作為港人『自決』前途的選項」，劉小麗因而被選舉主任指有關言行不符合《基本法》而被取消參選資格，按同一標準、同一把尺，朱凱迪更沒有可能「入閘」。

中央及特區政府遏制「港獨」是動了真格，朱凱迪要挑戰底線，必定碰得頭破血流，至於所有主張「港獨」、「自決」人士也不用心存僥倖，這個門檻堅如磐石，如果還想參選，就應早日反省、改弦易轍，以實際行動向選舉主任表明自己已經放棄「自決」綱領，這是他們唯一的出路。

資深評論員

選民對「民主派」愈來愈心淡



教育茶餐廳

何漢權

書，根本未有面對問題的核心，更談不上是道歉！

從教育角度看，這些「鏢票」、「心淡」論，實在需要加以補充說明，免得教壞學生，誤導大眾。民主選舉的真諦，不是要鼓勵參選嗎？不是說參選自由嗎？為何被「民主派」霸凌的人出選，就叫「鏢票」？假若這樣霸凌成功成事的，對民主是嚴重的扭曲。

再看「心淡」論，「民主派」的統一口徑，說這回落選的原因，是無法喚醒對政治心淡的選民出來投票，筆者看，「民主派」在議事堂上的事事反，「反中反共」已成癮

聲言「和平主張『港獨』」朱凱迪豈會擁護基本法？

近日，「自決派」立法會議員朱凱迪報名參加元崗新村居民代表選舉。由於朱凱迪在網上曾公開表示：「我自己當時至今的立場都是，我並不支持「港獨」，但我認為，香港人應該決定自己的命運」，於是選舉主任致函朱凱迪，詢問他是否支持「港獨」，以及是否提倡或支持「香港獨立」是自決前途的選項。

雖然朱凱迪在答覆上聲稱，自己並不支持「港獨」，但是他回答自己是否支持蘊含「港獨」選項的「自決」之時，則表明自己支持「包括但不限於修改《基本法》第158及159條，作為中共封殺『真普選』後，港人『自決』前途的目標」，又聲稱「和平主張「港獨」是港人受《基本法》保障的權利」云云。

朱凱迪的言論，是極有問題的。先說朱凱迪主張「修改《基本法》158及159條」，這說法本身便是含糊不清。雖說《基本法》可以按照第159條規定而修改，但是第159條第四款則表明：「本法任何的修改，均不得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抵觸」。換言之，《基本法》第158及159條未必不能修改，但是不能抵觸第159條第四款的規定。

問題的關鍵是，究竟朱凱迪主張修改《基本法》，具體上是怎樣改呢？他根本沒有說明。如果朱凱迪是要求藉着修改這兩條條文，從而取消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權，全國人大的修法權，又或者把第159條第四款的規定刪掉，便有可能違憲。因為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權及全國人大的修法權，乃是國家憲法第62（13）條和第67（4）條的法律延伸，既是中央對港全面管治權的體現，亦是我國在港行使主權的象徵。

可以說，《基本法》釋法權和修法權在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一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至於第159條第四款本身，則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更不可能主張廢

除。任何人提出損害中央對香港全面管治權的主張，已超出了《基本法》所規定下的香港高度自治範圍，亦等同主張破壞《基本法》規定下的「一國兩制」，根本不是真誠地擁護《基本法》和擁護香港特區。當然，所謂修改《基本法》的實質主張是什麼，朱凱迪似乎刻意沒把話說透，我們自然難以檢視他的主張有否違憲。可是，朱凱迪聲稱「和平主張『港獨』是港人受《基本法》保障的權利」，則在法理上完全說不通。因為任何「港獨」主張，均是違反《基本法》第1條中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規定。與此同時，《基本法》第1條的規定，分明是第159條第四款所講的，不存在任何修改的法理基礎。

有人或許會說，「港獨」雖是違憲，但是港人根據《基本法》第27條享有言論自由，《基本法》第39條列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香港人權法案》第16條則列明，港人擁有發表自由之權利。然而，《基本法》第42條規定，港人有遵守香港特區實行的法律的義務，《公約》第19條和《香港人權法案》第16條的第（三）款則列明，言論自由附有特別責任及義務，政府可因為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訂立本地法律加以限制。

此外，主張「港獨」的言論不但違憲，而且涉嫌觸犯現行《刑事罪行條例》第9條的煽動意圖罪。

由此可見，朱凱迪認為「和平主張『港獨』是港人受《基本法》保障的權利」，分明是混淆視聽。事實上，不論《基本法》、《公約》或《香港人權法案》，均不保障人們發表損害國家安全的言論。如此說來，朱凱迪又怎可能符合《鄉郊代表選舉條例》第24條的規定，又怎可能真誠地擁護《基本法》和擁護香港特區呢？

時事評論員

兩岸關係 楊親華

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最具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是重新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偉大起點。就對台工作而言，這次全會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對台工作大政方針戰略性調整的歷史起點。這次會議形成的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在綜合考慮黨和國家工作的根本任務、基本思路、發展戰略的基礎上，做出了爭取祖國和平統一的偉大決策，並形成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戰略構想，使解決台灣問題的理論和實踐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一）

新時期黨的對台工作大政方針的一個最為突出的標誌，就是爭取「和平統一」，實現「一國兩制」。這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工作中心轉移的同時，總結建國以來對台工作經驗討論新形勢下對台工作面臨的新問題、新情況，所做出的重大決策。

如何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完全統一？這是建國以來我國領導人就一直考慮的重

大問題。解決的方式無非是兩種，一是非和平方式，即武力方式；一是和平方式。從1950年開始，一直是準備以武力解決為主，但也爭取和平解決。1956年，新中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時期。毛澤東、特別是直接領導對台工作的周恩來，從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願望出發，適時提出一系列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重要原則和政策主張。周恩來概括為「一綱四目」。遺憾的是，「文化大革命」爆發，對台政策發生重大逆轉。

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偉大的歷史功績，就在於從根本上衝破長期以來「左」的思想的嚴重束縛，端正黨的思想路線，從實踐和理論上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將黨和國家的事業引向健康的發展軌道。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為三中全會做準備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這篇實際上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主題報告的重要講話，通篇講的都是解放放思想、實事求是。他強調，「只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

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12月18日－22日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正是用鄧小平的這一重要講話精神統一了全黨的認識，恢復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作出了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四個現代化建設上來，並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

這一歷史性決策決定了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方針政策。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需要一個和平穩定的內外環境。作為事關中國統一大業最重要的台灣問題，是用和平方式還是用非和平方式解決，就成為一個擺在黨和國家領導人面前的急需回答的重要問題。

鄧小平後來說過，「一國兩制」是根據實際情況提出的構想，首先是從台灣問題開始考慮的。鄧小平在恢復中央領導崗位後，即開始對黨和國家的未來進行戰略思考。與此同時也開始了對台灣問題的思考。當時鄧小平對台工作的思考發展過程可做如下簡要追溯：

1977年8月24日，會見美國國務卿萬斯時，鄧小平說，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別人不能干涉。我們準備按三個條件（即廢約、撤軍、斷交）實現中美建交以後，在沒有美國參與的條件下，力求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但不排除用武力解決。中國人民、中國政府當然會考慮台灣的實際情況，採取恰當的政策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的統一。

1978年1月4日，會見美國民主黨參議員肯尼迪一行時，鄧小平說，台灣問題何時用何種方式解決是我國內政，但在解決時我們會注意到台灣的特殊情況。

10月22日鄧小平訪問日本。25日在同日本首相福田赳夫會談時，鄧小平表示，國際上所有存在一分為二狀況的國家，總有一天是要解決的。就我們來說，就有台灣問題要解決。問題不成熟，可以慢一點解決。我們將在充分尊重台灣現實的基礎上，來解決台灣問題。

11月14日，在會見緬甸總統吳奈溫時，

查詢朱凱迪「港獨」立場有必要

「濫權」，反而是一種負責任的做法。朱凱迪有必要清楚說明，他對「港獨」立場有否存在不一致的地方。

朱凱迪又質疑，自己只是參選村長，村長當選後亦沒有如立法會議員那樣宣誓就職的要求，所以選舉主任亦不應該依照立法會選舉的要求，向他提出詢問。

筆者不認同朱凱迪的這一觀點，鄉郊代表雖然不同立法會議員，但同樣要依照相關的選舉法律完成選舉程序，既然《鄉郊代表選舉條例》第24條有要求候選人簽署聲明，選舉主任就必須依法嚴肅對待該份聲明，這一點完全沒有問題。

鄉郊選舉雖然只是基層的地方選舉，但同樣是香港特區內一項選舉，同樣要動用公帑，同樣須要遵守《基本法》以及本地法律。筆者認為，《基本法》和本地法律均沒有允許「港獨」的空間，香港的公帑亦不能被人用於與「港獨」有關的事項，包括不能容許支持「港獨」的人參選。

朱凱迪雖然表明不支持「港獨」，但他支持「港獨」作為港人「自決」的選項，這與支持「港獨」無異，選舉主任應嚴格依法作出裁決。

民建聯秘書長

鄧小平對台工作大政方針的思考與決策(上)

鄧小平又指出。在解決台灣問題時，我們會尊重台灣的現實，譬如，台灣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動，美日在台灣的投資可以不動，那邊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動。但是要統一。

11月28日，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蒂爾時，鄧小平表示，台灣歸還中國，實現祖國統一，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將尊重台灣的現實來解決台灣問題。台灣的社會制度同我們現在的社會制度當然不同，在解決台灣問題時，會照顧這個特殊問題，「中華民國」的名稱要取消，它可以成為地方政府。根據現實情況，可以保留它的資本主義制度。

從上述鄧小平關於台灣問題的一系列政策性講話可以看出，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在當代中國歷史轉折關頭，鄧小平已經基本勾畫出我們黨關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政策框架：尊重台灣的現實，考慮台灣的特殊情況，或照顧台灣的特殊性，台灣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動、生活方式可以不動，美日等外資在台灣的投资可以不動，但國家必須統一，實行第三次國共合作。（明日刊出下篇）